



郑国庆 著

美学的位置： 文学与当代中国

闽派批评新锐丛书
南帆 刘小新 主编



美学的位置： 文学与当代中国

郑国庆 著

闽派批评新锐丛书
南帆 刘小新 主编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海峡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美学的位置:文学与当代中国/郑国庆著. —福州:
海峡文艺出版社, 2016. 7

(闽派批评新锐丛书/南帆, 刘小新主编)

ISBN 978-7-5550-0663-3

I. ①美… II. ①郑…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
—文学评论 IV. ①I206.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69831 号

闽派批评新锐丛书为 2015 年度福建文艺发展基金资助项目

美学的位置:文学与当代中国

郑国庆 著

责任编辑 王顿顿

助理编辑 蓝铃松

出版发行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海峡文艺出版社

经 销 福建新华发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社 址 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 14 层 邮编 350001

发 行 部 0591—87536797

印 刷 福州凯达印务有限公司 邮编 350008

地 址 福州市金山橘园洲工业区台江园 6 号楼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字 数 200 千字

印 张 12.25

版 次 2016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50-0663-3

定 价 4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厂调换

总 序

◎ 南帆

“闽派批评”的称谓一度流行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当时，为数众多的闽籍批评家同时跻身于文坛，登高而呼，雄辩滔滔，许多重大命题的确立隐含了他们的思想贡献。强烈的理论兴趣无形中造就了一个醒目的群体，“闽派批评”即是对于这个群体的命名。正如人们所见到的那样，文学史上许多命名并非精心策划或者深思熟虑的产物，相当一部分美学潮流或者学术派别的命名是由于不无偶然的历史机缘，例如“现实主义”“浪漫主义”“朦胧诗”，或者“形式主义学派”“达达主义”“耶鲁四君子”，如此等等。“闽派批评”之称并非来自学术特征的严谨概括，这个命名毋宁说源于一个简单的事实：闽籍批评家的人数明显超过了各个省份的平均数。

可以列举的闽籍批评家名单洋洋大观。一部分批评家长期身在京沪，例如谢冕、张炯、刘再复、陈骏涛、童庆炳、程正民、何镇邦、张陵、李子云、潘旭澜、朱大可等等。他们多半是年轻时外出求学，毕业之后就职于京沪的学院或者研究机构。另一部分批评家长期活跃在闽地，例如孙绍振、许怀中、刘登翰、林兴宅、王光明、俞兆平、朱水涌、杨健民、谭华孚、南帆等等。个别批评家的活动轨迹相对复杂。陈晓明当年已经在闽地崭露头角，继而求学、定居

北京；谢有顺求学于闽地，登上文坛的时候已经栖身于粤地。

如此多元的成长背景显明，闽籍批评家并未承传某种共同认可的文学观念。因此，“闽派批评”并非一个彼此师承或者同声相应的学派。从传统的现实主义、人道主义到主体论、科学主义、后现代主义，闽籍批评家活动在跨度巨大的理论场域，分别充当不同主题的领衔主角，譬如谢冕、孙绍振之于新诗论争，刘再复之于文学主体性，陈晓明之于后现代主义。

为什么闽籍批评家如此之多？如此旺盛的理论兴趣是否具有地域性的文化渊源？朱熹、李贽、严复不仅是闽籍著名的思想家，同时，他们的文学观点与哲学思想、政治理念相互呼应。闽地的历史上还出现了一些文学批评家，他们在诗论方面尤有建树，譬如严羽、魏庆之、刘克庄等等。严羽的《沧浪诗话》最负盛名，“以禅喻诗”之说在诗歌批评史上影响久远。至于辜鸿铭、林纾、林语堂、郑振铎均为文化大师，他们分别具有独到的文学理解、文学实践与文学评判。总之，历史上的闽籍思想家提供了丰富的理论思想资源，以至于坊间有“闽人好论”的戏言。尽管如此，我们仍然无法考证，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集体崛起的闽籍批评家具体地受惠于哪些思想线索。他们相对一致的认识是，地域性的文化渊源无非是一个遥远的背景，“闽派批评”的浮现更多地取决于特殊的历史机遇。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解放的叙事逐渐成为主旋律。作为解放叙事的先锋，文学承担了摧枯拉朽的使命。文学批评的意义是扩大战果，开拓理论纵深。闽籍批评家接手的第一个理论战役是“朦胧诗”之争。七十年代末期开始，一批风格迥异的诗人开始集结。他们的诗作充满了象征、意象和反讽，情绪忧郁、悲愤、孤寂，音调嘶哑。八十年代初期，这些诗作陆续出现在刊物之上，立即引爆了激烈的争论。对于习惯颂歌与战歌的批评家来说，这些诗作古怪艰涩，主题朦胧——令人气闷的“朦胧”是当时的著名评

语，也是“朦胧诗”之称的来源。这些诗人的中坚之一舒婷居于闽地，她的诗作被视为尖锐的挑战。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诗风？《福建文学》率先发起争论。一时之间，应者云集，诸多批评家见仁见智，蔚为大观。这一场争论成为许多闽籍批评家的发轫之处。

《福建文学》策动的论争延续到一九八〇年的“南宁诗会”，掀起了一次新的波澜。闽籍批评家谢冕、孙绍振勇敢地为“朦胧诗”辩护，张炯担任会议的组织和主持人。会议之后，谢冕在《光明日报》发表论文《在新的崛起面前》，继而又在《诗刊》刊登《失去平静之后》。如果说，谢冕的主旨是告诫人们沉住气，保持宽容，勇于接受挑战，并且历数文学史上成功的变革，那么，孙绍振力图阐发的是新诗背后的美学原则——“与其说是新人的崛起，不如说是一种新的美学原则的崛起”。他的论文标题即是《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异于颂歌与战歌的传统，新诗追求的是“生活溶解在心灵中的秘密”。在孙绍振看来，这种美学原则的深刻根源是人的价值标准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至少在当时，这些观点惊世骇俗，以至于谢冕、孙绍振不得不承受学术之外的巨大压力。时至今日，“朦胧诗”已经得到了文学史的认可，谢冕、孙绍振的“崛起”之说酿成了新的理论话题。王光明、陈仲义等闽籍批评家之所以能够对于新诗进行卓有成效的后续研究，他们的开疆拓土功不可没。

“朦胧诗”争论之后，众多闽籍批评家共同卷入的另一个理论事件是“文学批评方法论”的论争。由于解放的叙事纵深扩展，思维方式的改变是迟早的事情。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文学批评再度走到了前面。如何解读文学？是不是仅有社会历史批评的唯一视角？各种零星的尝试和实验之后，理论的总结势在必行——“全国文学评论方法论讨论会”于一九八六年的春天在厦门召开。当时，符号学、精神分析学或者接受美学等诸多西方批评学派尚未登陆，打动批评界的是以自然科学为范本的科学主义。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被

奉为时髦，不少文学研究论文以列举图表、数据与数学公式标榜科学精神。厦门会议的论辩之中，林兴宅抛出了一个大胆的命题：“诗与数学的统一”。马克思曾经认为，任何一门科学只有充分利用了数学才能达到完美的境界。诗与数学的统一显然是这种观点的美学追随。不过，过度的科学主义引起了另一些闽籍批评家的非议。在他们看来，科学方法仅提供各种描述真实的视角。如果无法确认文学批评力图阐述何种价值观念，批评家又怎么知道选择哪一种描述视角？因此，没有理由用貌似客观精确的科学话语覆盖人文情怀。

几乎与文学批评方法论的讨论同时，闽籍批评家刘再复提出了文学的主体性。这种观点是文学对于主体哲学的致敬。刘再复分别阐述了作为创造主体的作家、作为文学对象主体的人物形象和作为接受主体的读者和批评家。尽管现代哲学对于主体概念的种种质疑不可避免地波及文学主体性命题，但是，多数人深切地体会到隐藏于这个命题背后的苦心：构筑一个以人为思维中心的文学理论与文学史研究系统。在这个意义上，闽籍批评家的理论工作显示了一脉相承的连续性。众多闽籍批评家的知识谱系相距甚远，可是，他们不约地围绕相近的问题持续地思考，这只能解释为历史的迫切性。

“闽派批评”的出场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当年，王蒙曾经对文学批评发表过一个颇具影响的观点：“闽派批评”堪与京派、海派呈三足鼎立之势。籍贯、地域文化渊源、历史机遇——“闽派批评”命名的依据显然是三种因素的相加，尽管三者的意义并不相等。然而，这个命名之所以普遍流行，显然得益于几次影响广泛的批评实践。没有批评实践的支持，种种人为的舆论吹嘘走不了多远。必须补充的一个事实是，福建省文联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创办的一个理论刊物《当代文艺探索》为“闽派批评”的粉墨登场提供了重要的舞台。尽管这个刊物仅仅存在三年多的时间，但是，京、沪、闽三地众多闽籍批评家担任这个刊物的编委，刊物发表了“闽派批评”的许多

重要论文。因此，谈论“闽派批评”的组成范围，通常会提到《当代文艺探索》的主编魏世英，副主编王炳根、林建法、林焱和编辑王欣。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闽派批评”之称逐渐淡隐。当然，这不等于闽籍批评家销声匿迹。一些批评家虽然年事已高，但是，老骥伏枥，他们仍然密切注视文坛的动向，不时发表真知灼见。更多的批评家精思不辍，开拓不已：谢冕对于诗歌一往情深，他的主要工作始终聚焦于诗歌领域；王光明、陈仲义与谢冕相近，诗歌的信徒是他们从未放弃的身份；相对地说，孙绍振的学术战线辗转不定，他曾经涉入普遍的美学问题，继而转向了微观的文学写作、经典文本分析和中学语文教育；刘再复移居海外多年，置身于另一种文化环境，沉思中国文化传统的种种重大课题。如果言及闽籍批评家转身幅度之大，刘登翰或许是一个特殊的例证。他于九十年代逐渐转向了海外华文研究，不仅成绩斐然，而且形成了学术梯队，其中佼佼者如朱双一、刘小新、朱立立和袁勇麟等。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之后，“文化研究”的学术背景将性别研究推向前台，闽籍批评家林丹娅积极介入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至于陈晓明、朱大可、谢有顺俱已卓尔成家，他们广泛涉及当代文学及当代文化的各种问题，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由于学院造就的良好学术环境，许多出生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八十年代的闽籍批评家正在迅速地成熟……相对于闽籍批评家二十多年的工作状况，这些描述无疑挂一漏万，我企图借助这些描述提出的问题是：面对如此之多的学术资源，是否到了重提“闽派批评”的时候了？

重提“闽派批评”，制造乡贤的学术聚会或者地域文化表彰仅仅是次要目的。重要的是发现新型的话语平台，召回曾经活跃的批评精神。闽籍批评家是不是可以如同当年一般犀利骁勇，积极介入各种重大的文学话题，正本清源，激浊扬清？很大程度上，这同时是

文化环境的迫切要求。

现今的文化环境之中，文学批评正在滑向边缘。娱乐新闻、明星八卦以及形形色色的游戏节目占据了大部分传媒的版面；许多人心目中，网络文学几乎等同于文学的范本。与此同时，经典文学体系的声望急剧下降，“严肃”正在某些人心目中演变为令人厌倦的品质。这时，文学批评何为？文学批评将在这个时代文化之中扮演什么角色？愈来愈多的批评家意识到这个问题的分量。二十世纪曾经被称之为“理论的时代”。繁盛的理论生产为文学批评提供了多种考察文学、考察世界的视角。批评家可以发现各种文学话题，还可以借助文学话题阐述对于世界的各种观点。“闽派批评”的历史证明，由于批评家不懈的呐喊、辩驳、阐发和倡导，某些显赫一时的声音消失了，另一些大逆不道的观念逐渐成为共识。作为文化空间的开拓，文学批评的意义远远超出了文学范畴。如果说，“闽派批评”的称谓曾经贮存了丰盛的文学记忆，那么，许多闽籍批评家即将开始面对另一个新的故事：这个称谓如何内在地织入文学的未来？

新生代批评家的加盟，即是这个故事的最新发展。唯有新生力量的持续涌现并且不断发出独特的声音，“闽派批评”才能真正重新出发，发扬光大。新生代批评家大多具有严谨的学术训练，理论视野开阔，他们代表了“闽派批评”的未来。编辑出版“闽派批评新锐丛书”，即是集中展示这些新生代批评家的实力与个性，注释“闽派批评”这个称谓的崭新内涵。

是为序。

（南帆，本名张帆，现任福建省政协副主席、福建社会科学院院长、福建省文联主席、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导师，出版学术著作和散文集多种，曾获鲁迅文学奖、福建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多项。）

前言

这本书收录了我走上文学研究道路后一些阶段性的文章。

最早的《全球化时代的自我认同》是研究生时读王安忆《我爱比尔》有感写下的一篇评论。那是我第一次尝试用比较学院的方式从事文学作品的分析。此前作为一位文学青年，我也曾在书页边、笔记本上信手涂抹过一些随感，那多半是一些情绪性的抒发或者漫无边际的吐槽；这是第一次使用文学研究的工具来把自己散漫的思绪条理化，是对文学感性的一次理性整理，这也预示了文学研究之于我的意义：感性与理性、生活经验与理论思考之间不断往返的交错与对话。在硕士、博士阶段我写了不少文学批评，其中好几篇发表在《读书》上，作为一位籍籍无名的学生，《读书》只认稿件的作风令我感佩，与我联系的编辑孟晖也总是毫不客气地指出我的文章缺点。我读过小说《孟兰变》，对那种清秀典丽的风格印象深刻，但一直不清楚此孟晖是否是写小说的彼孟晖。后来按捺不住好奇心在信件往返中问起，孟晖回答说：是。后来《读书》改组，孟晖离开，我们就失去了联络。我要在这里谢谢彼时她作为一名编辑对一位年青学生的鼓励与帮助。

在研究生阶段我花了很多时间在“理论”上，那时正是结构、后结构理论开始在中国走俏的时候。那些佶屈聱牙的译本经常弄得我头疼欲裂，但读懂的时候也常给我一种豁然开朗之感。作为在20世纪80年代遗留的文化空气中成长的文学青年，此时要从80年代迷人但空泛的人文主义典范跨越到貌似冷静的结构主义典范，对于我来说并不容易。好在我的导师南帆很早就开始了他自



己的“语言转向”，在他的指导下我也慢慢地摸清了西方理论的大致脉络。2002年暑期我去清华大学参加刘禾主持的高级理论研讨班，每天抱着两大本厚厚的英文教材苦读，在宿舍与教室之间过着两点一线的生活。那个高密度的北京之夏帮助我克服了对英文原著的畏难心理，对后结构理论也有了更深一层的理解。时至今日我自认仍然是一个人文主义者，对自由平等多元的启蒙价值依然抱持着信念，但经过后结构理论洗礼，失去了天真状态，对各种本质主义思维与大叙事深怀警惕。

我读研的阶段同时也是中国知识界开始所谓“新左”与“自由主义”分裂的时候。读研之前我曾在政府部门和外资公司工作过几年，对于权力与资本的运作都有不同程度的体验，也深感个人于其中的不自由。因此，我对“新左”与“自由派”对我们正在经历的这个巨大社会变迁的解释有浓厚的兴趣，我迫切地想要了解他们争论的焦点到底是什么，我自己又该有怎样的判断。于是除了自己的专业学习，这个时候我也开始大量涉略“新左”与“自由主义”的思想史、政治哲学、社会学的著作。在紧张地游弋于两边的思想光谱之时，博士论文的写作任务也迫在眉睫。虽然感兴趣的问题很多，我对自己跨学科的能力并没有信心，所以还是决定回到文学上来。那时候文学界的左右之争也已开始，“反思纯文学”、“底层写作”、“新左翼文学”，在早已过了“思潮”时代的文学界也掀起了一些小小的思潮。我对20世纪90年代文学期刊上成规化的“先锋文学”早有烦厌，在熟悉他们的套路之后，觉得它们不及物的作风并未提供我对这个世界更深刻的洞察，因此自然地站到了反思纯文学的一边。既然先锋写作并未提供更多的发现，那么被先锋弃之敝屣的现实主义文学是否还有它焕发活力的可能？于是我选择了滥套的“现实主义”作为我博士论文的研究对象，我想从西方18世纪“小说的兴起”（伊恩·P. 瓦特）开始追溯现实主义美学在西方的发展脉络，它的理论涵义（结构以及解构），以及作为后发现代国家，这套移植的西方美学在中国的转化与特殊意涵。我想也许通过爬梳，我能够对“现实主义”在当代中国的文学意义做出自己的回答。答案并不如我的预期，我对现实主义的期望在研究过程中逐步降低；在论文写作的过程中我也开始意识到，作为一位研究者与作为一位批评家的角色差别，批评家怀改变世界的抱负，学者则尽可能对历史过程作客观的描述与解释。在“现实主义”显露了如此多的破绽之后，我为什么还要去“拯救”这一个问题重重的概念？

我相信现实主义美学仍然会有它的生命力，但也只是美学形式的某种选择，并不天然具有创作的优越性。在中国，“现实主义”曾经发挥的巨大效力更大程度上不是来自它的美学形式，而是来自它的意识形态。现实主义与民族主义、社会主义的连接，才是它超越美学范畴成为中国文学超级能指的原因。眼下反思纯文学，对底层写作、现实主义的倡扬不过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反复重演的对文学定义、功能、评判标准的左右之争。就近来说，台湾20世纪70年代乡土文学运动对现代派的攻击，与中国大陆20世纪90年代反思纯文学对现代主义的批判如出一辙（其中乡土文学运动的领袖陈映真跨越了20世纪70年代的台湾与90年代后期的中国大陆，成为海峡两岸左翼知识分子的重要标杆）。它们所涉及的，远不止是美学的判断，更是现代性方案的想象、意识形态的分歧。现实主义与集体主义、马克思主义，现代主义与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构成了中国现当代“文学论争”背后真正的文化/意识形态动力，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反复上演的戏码。本书的附录《追问“现实主义”》是应徐志伟所作的“70后作家、批评家系列”的访谈，概述了我对现实主义的思考。我一直觉得我的博士论文完成得不尽人意，学术上无甚贡献，但对于个人来说澄清了一些困扰我许久的美学与意识形态的问题，因此把它收在这里作个纪念。

在做完现实主义的研究之后，我又花了好几年的时间重新摸索被反思的“现代主义”。对20世纪80年代现代主义的批评如今更携带后殖民理论的锋芒，直指它臣服于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化被殖民心态，是一种与“现代化理论”相匹配的西方中心主义的“世界”想象。这样的论述的确犀利带出了东西方之间不平等的知识/权力关系，但是不是对文化流动的语境转换，本土主流话语的权力效应估计不足？正如我在前面所说，中国现代主义的对话对象是中国版的现实主义（同样是经过本土改造但占据主流权力位置的西方话语），它对于“个人”的深刻思索在中国并未得到充分的消化与吸收。现今重读陈焜先生1981年出版的《西方现代派文学研究》，对于他所强调的现代主义对于人与世界“复杂性”的认识仍然深有感触。事实上，现代主义的美学与认知精神在中国远未扎下根来。中国学界经常笼统地将80年代的“现代派”与“先锋派”统称为现代主义潮流，然而准确地说，在中国脉络里，它们代表了不同的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典范，我们的现代主义初窥门径，后发国家“压缩的现代性”已经驱赶着中国作家匆匆忙忙地跳上后现代主义的火车，对现代主义“本

质的双面性”(大卫·哈维语)的精神探索为自反、叙述圈套等后现代语言嬉戏所取代。而今在商业主义的文化环境中,现代主义视文学为个人生命意义准宗教追求的文学态度更是明日黄花,“故事还是要好看”的现实主义美学趣味仍是当仁不让的主流品味。不过现代主义作为一种高层文化(High Culture)追求,原本就有极浓的精英与智性取向,因此它在文化商品时代的边缘命运也就不足为奇。所幸的是,虽然现代主义在中国并不走俏,然而总是有一些孤独的身影坚持着不绝如缕的艺术与精神探索,比如已逝的史铁生(他的《务虚笔记》与《我的丁一之旅》是中国当代文学当之无愧的经典)、残雪,21世纪的薛忆沩、陈希我等。

在我兀自在现实主义/现代主义、“新左”/“自由派”的美学与意识形态打转之时,中国当代文学的商品化进程早已如火如荼。虽然王朔已在大众文化领域驰骋多年,我并没有将当代文学商品化的结构变化充分放置在思考框架内。第一次比较清醒地意识到这个问题,反而是受到了《收获》——中国当代“纯文学”刊物的提醒。当时我周围的中文系女研究生,有好几位颇喜安妮宝贝。安妮宝贝是第一代网络文学的代表作家,我对网络文学并无偏见,因此也上网浏览了安妮宝贝的作品,读后觉得此人语言流利,切分短句颇具自己的风格,然整体来说不过是新型都市言情,只是外形上多了一些形上色彩,然而也不过停留在表面。随着安妮宝贝越来越走红,当我有一天同时在中国最畅销的都市时尚言情杂志《花溪》和中国顶级的纯文学刊物《收获》看到安妮宝贝作品的时候,我忽然意识到一个新的文类——中额文学(Middlebrow Literature)出现了,在高层文化(High Culture)和大众文化(Mass Culture)之间,一个适应都市中产消费者的、追求精致品位、意识形态倾向停留于安全地带的文化品类在更加现代化、都市化的中国开始本土化。联系到此前《收获》推出的余秋雨,同时期的须一瓜,他们分别代表了抒情传统、现代主义、现实主义挪用到中额文类所产生的美学样貌,文字流畅、叙事迷人,具有专业水准,价值取向“真善美”,为城市中产读者提供了适切的“精神家园”、文学读物,在文化市场上都有相当不错的成绩。

与此同时,这些新起的具市场吸引力的文学品类也必须与中国急剧发展的流行文化市场,快速流通的全球性文化产品竞争受众。随着20世纪末全球化加速、数字科技的革命,全球文化昂首迈入了一个各国争相发展“文化产业”



的新纪元。这一波文化产业、创意产业的潮流超越了20世纪法兰克福学派意义上贬抑性的文化工业范畴，成为国家产业升级、文化外交、软实力展示的新手段。20世纪90年代初风靡东亚的日本偶像剧、动漫、可爱产品，90年代末异军突起、延续至今的“韩流”，证明流行文化在某种程度上已取代传统文化，成为促升经济发展，打造国家形象的主导文化。大批人才被吸纳进流行文化领域，流行文化的正当性大幅度上升。同时，即时性、交互式的数字媒体也改变了传统一对多的媒体方式，文化生产、流通、消费的模式改变，“参与式文化”（participatory culture）蓬勃发展，各式各样“粉丝社群”所表现出的草根创造力是明显的例证。这些新的历史变化、文化生态直接冲击到文学研究者心目中原本占有精英位置的“文学”，迫使我们重新设定坐标，调整相关的概念与定义，检视我们赖以进行分析的一些前提与假设。从这个角度而言，学界近年逐渐兴起的有关“体制”、“场域”的思考框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不可或缺的文化/文化社会学的视野。我们有必要将文学放置在一个整体的文化脉络中来考察，从生产、流通、接受各环节，在政治、市场、科技与美学的交错中勾勒出一个更清晰的图像。本书中的《中国当代文学体制的变革》、《后革命的主流美学》就是这样的尝试。在下个阶段，我想我会将研究重心更多地转移到流行文化、数字媒体与全球文化流动的问题上来。

我的写作很慢，产量稀少，主要原因当然是自己性格散漫，工作不力。然而一路走来也得到许多师友的关注与帮助，我希望能够在此略略表示对他们的感念与感激。我要特别谢谢美国德州大学的张诵圣教授，多年来与她的交流讨论，尤其是在德州大学一年的客座经历，使我受益良多；她的专业的学术态度、精湛的研究能力，以及总是努力站到对方立场、对不同的观点和意见加以理解的自由主义式的包容，是我心仪的风范。

目 录

第一辑 文学史观察

中国当代文学体制的变革	(3)
后革命的主流美学：从王朔到韩寒	(17)
安妮宝贝、“小资”文化与文学场域的变化	(31)
从“乡土”到“海洋” ——台湾文学的“海洋”书写	(40)

第二辑 作品解析

全球化时代的自我认同 ——论王安忆《我爱比尔》	(51)
“生活”，看到与没看到的	(59)
王安忆：上海“京派”与社会主义记忆	(66)
主体的泯灭与重生 ——余华论	(77)
浪漫爱在人间世	(87)
复杂与单纯 ——读韩少功《日夜书》	(96)
乡土中国的崛起寓言 ——读阎连科《炸裂志》	(103)
《荒人手记》与朱天文的警世寓言	(110)

当代小说短评小辑	(117)
----------------	-------

第三辑 方法述评

学术、理论与历史语境

——南帆与当代文学研究	(137)
“现代主义”、“文学场域”与张诵圣的台湾文学研究	(147)

附 录

批评的位置与文学研究的路径	杨 玲 (157)
郑国庆学术简表	(167)
追问“现实主义”	
——郑国庆访谈录	徐志伟 郑国庆 (170)



中国当代文学体制的变革

第一辑 文学史观察